

# 爱的教育,诞生在石榴船上

□华明玥



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 
2022年12月  
曹文轩《石榴船》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水网交错的苏北地区,船工们都在驳船上安家,跟着货船四处漂泊,因为父母的工作性质,他们的孩子无法上岸接受教育。有一天,县里派来的叶文林老师登上了四海船队,叶老师在摆放了一盆石榴树的第十号驳船上,创建了水上学校,手把手地教导孩子们识字读书,帮助他们走向辽阔的世界……这便是小说《石榴船》所创造的“爱的教育”的唯美画卷。

三十多年前,国际安徒生奖得主曹文轩老师还是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作家,他在访问故

乡的一所水上学校时,目睹唯一的老师在摇荡的船上敲钟、上课、批改作业,照管那些水性极好、一言不合就要跳下水猛游一阵的野孩子,目睹师生们在晴空下升旗、演讲、朗读课文,目睹在老师持之以恒的栽培下,孩子们从懵懂无知到文明知礼的蜕变……曹文轩老师意识到,“对小说家而言,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故事。”

但曹文轩并没有急于落笔,他的野心很大,仅仅诉说一所水上学校的故事,歌颂两代教师点亮文明之光,还不足以抵达曹文轩心中关于教育的梦想。在他心中,教育需要有“上善若水任方圆”的弹性,教育不只是改变下一代,也是改变那些固执又脾气火爆的成年人——孩子们的父母。教育当然会经历波折,然而正是因为波折层出不穷,教育者与被教育者才有机会享受那种相洽的暗喜,享受彼此启智的无穷妙趣,体会贴心贴肺的深情情义,最终,教师、学生、家长,都找寻到自我的价值。

三十多年时光流逝,这一梦想终于在纸上徐徐展开,一部多声部的大雅之作深情奏响:曹文轩为我们带来了《石榴船》,小说聚焦小主人公大船从懵懂无知到文明知礼的成长蜕变,生动刻画出一位怀抱理想、充满耐心与智慧、甘于奉献的青年教师的形象。

阅读整部小说,令我折服的,就是曹文轩在人物塑造与作品结构上带来的耳目一新之

感。小说一开始就非常吸引人,由那个多余的钟引出了船上孩子对上学的渴望。随着叶老师的上船,家长们亲自动手,在十号驳船的舱口铺上板子,做出一间木屋,就是教室了。时不我待,水上学校的第一堂课就这样开始了。

在水上野惯了的孩子,教育起来并不容易,比如对小主人公大船的描绘就令人忍俊不禁:“他的记性其实很好,三岁的时候,船队连续航行十多天,等返回时,他居然能将曾经路过的村庄的名字一个个地说出来。可是现在,还是那颗脑袋,那些字、词和句子,好像不想和他认识似的。”

大船脾气倔强,当他受了委屈不想再上学时,会撕掉课本丢进水里;他勇敢,看见同学落水,不假思索地跳入水中营救;他极富爱心,哪怕是船上的石榴树和白猫茉莉不慎落水,为了救它们,小主人公都会义无反顾地扎进水中。为了让大船的头脑开窍,叶文林老师特意安排由大船为其他孩子读书,叶老师不无狡黠地发现,安排大船来读这些书,“是将其吸引到学习的路上,最美好而有效的手段。”从诸多诸如此类的生动故事中,读者很容易发现小说的主旨:好的教育不是打击与斥责,而是一种包含期待的尊重,这种尊重,必须充盈在老师与学生之间,也充实在老师与家长之间。这才是爱的教育,它如盐在水,了无痕迹却带来了鲜活

的滋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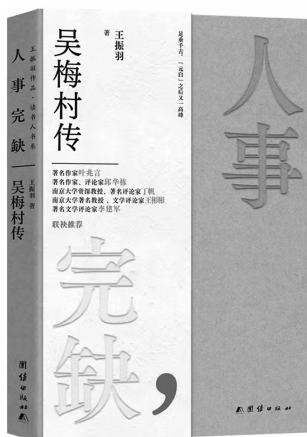
教育不仅局限在课堂。船队生活艰苦,曹文轩也没有回避船民们和其他船队的冲突、碰撞,这股来自生活底层的力量野蛮而又真实,但叶文林用自己的智慧,带着孩子们去直面和化解一次次冲突。最终,四海船队的家长们也被感化,家长们由衷地说:“人总得文明一点儿才好。叶老师,你是对的!”

小说的结构之巧妙也值得一说。在小说中,石榴树、白猫和铁钟等事物不时以第一人称来一段拟人化的自述,这自述,交待其跌宕起伏的经历,推动故事发展,烂漫纯真又变化莫测,既像歌剧中的多声部咏叹调,每一个人、每一件物品都有自己的“唱法”,能“唱出自己独有的性格”,又仿佛是初中物理的并联电路和串联电路,巧妙地将不同的小故事连接在一起,此后,我们打开某一个“开关”,灯泡们就有规律地被点亮,它们的光彩和吸引力,瞬间就照亮了读者的脸。这种阅读的愉悦,令小说摆脱了按时间行进的枯燥感,让整部小说的叙述视角交相辉映,故事变得起伏有致、多变而诱人。

这部现实主义儿童小说,从任何一页开始阅读,你都会品味到一个个像石榴籽一样的小故事,而它们合抱、组合在一起,折射的,恰是“爱的教育”特有的光芒。这是一代又一代叶老师的追求,也是我们这个民族未来的期望。

# 唯将痛苦付洄澜

□王振羽



2023年8月  
团结出版社  
王振羽《人事》

汝水蜿蜒曲折,汇入沙河,最终注入淮河,入江,进海,是在莽莽中原大地上一条很不起眼的河流。但,再名不见经传的河流,也有自己的来路与远方,也有自己的欢歌与哀愁。汝水汤汤,两岸多河湾。故乡的村落沿着河流星罗棋布,也就多称作湾,如郝湾、王湾、殷湾、蒋湾、马湾等,多与姓氏有关,大多是聚族而居,生息繁衍,代代相传。

爹娘退休后决意回汝水南岸的偏僻小村居住,乡野清静,远避喧嚣。这样一来,三个儿

子也就要经常回到村子里看望、陪伴老人。清晨早起,午后闲暇,陪着爹娘多在汝水大堤上散漫闲走,乡人称作“悠悠”。流水默默,旷野静寂。日落月出,繁星满天。走到荒村西北一隅大致在裴昌庙北、沟刘东、王湾之南,有一辽阔浩淼的平畴苍茫,阡陌纵横。父亲多次说过,此处本有村落,也有河道,村落唤作薛湾,河道更改,桑田沧海,被称作枯河。薛湾徒留其名,这里曾经的烟火人丁去了哪里?乡村里口头流传,此村灭绝,是在明末鼎革之际,闯王纵横中原,在著名的襄城之战中,薛湾人口绝灭,化为灰烬,顿成一片废墟,残垣断壁,荒草离离,日后就被开垦为耕地了。

荒村北寨门外,汝水大堤之下,是乡村小学,父亲在这里当民办教师多年。北寨门之上有民国时期的题额,称作汝水门。在这所乡间小学里,几间平房,一个操场,稀稀疏疏的树木,四邻八村的儿郎,弦歌不辍,也是文脉一缕。经常有乡人来与父亲聊天,海阔天空,无话不谈,就会说到这一乡村的起源,实在是纷纭得很,多说是洪武年间从山西洪洞县迁徙而来;但也有人认为,村落形成的时间更早,至少在郦道元的《水经注》里就有文字痕迹了。就是在这样的乡村小学里,跟着父亲读书,尔后到了小镇上读初中,又到了昆水河边的古城上中学,再后来就是到扬子江边的石头城上大学了。受父亲的影响,读背《论语》等经典,熟读

《史记》有关篇章,在自己粗劣不堪的本子上歪歪扭扭地抄写一些诗句,除了李白、杜甫外,有龚定庵,也有吴梅村,还有元好问。

二十多年前,决意写吴梅村,也得到父亲的鼓励,就翻找资料,仔细体会,大致在十七年前出版了自己眼中的吴梅村。说实话,明清易代,血泪斑斑,残酷血腥,令人压抑,近乎要使人窒息的地步。此后多年,不再愿意触碰明清交替这一历史大变局,这一凄厉悲惨历史中的纷纷扰扰恩怨纠结。在研读吴梅村之前,我曾耗费心血,解读过龚自珍,并因此与京城梁光玉先生结缘。

多年后,梁光玉先生眷念故人,让我修订关于龚自珍的书稿,拟在定庵先生的《己亥杂诗》写就170周年之际推出,但琐事缠身,一拖再拖,最终在龚自珍猝然离世180周年得以出版。因此之故,梁光玉先生、李可女史又热心建议让我修订吴梅村的书稿,最好能在吴梅村辞世350周年交稿付梓。我犹豫再三,唯恐辜负,却还是答应下来。

现在重温吴梅村,重新审视他在历史大变局中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,重新梳理他并不漫长却跌宕起伏的一生遭际,感慨万千,情难自禁。他是崇祯朝的榜眼,他也曾到过已是伏壁避地的中原,他也深陷党争之中左冲右突无可奈何。变局中的侥幸而已,他在甲申巨变之年不在北京,他在弘光小朝廷土崩瓦解开门迎降之时已经抽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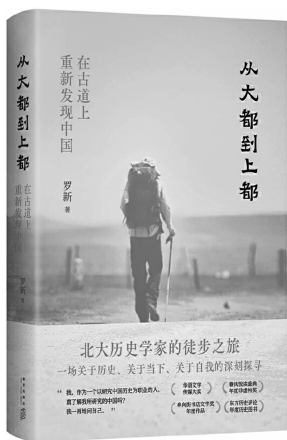
而退返回太仓,他在清军横扫江南兵临太仓城下之际携家带口远遁太湖江村。

此后的大局已定,朱明残余势力苟延残喘,他有目睹,更有耳闻。他不同于陈子龙、杨廷麟,他不是钱谦益,又不同于冒辟疆,他也有别于龚鼎孳。他用自己的诗、词、文,当然还有剧,记录这个时代,反映这个时代,审视这个时代。《圆圆曲》《鸳湖曲》《殿上行》《襄阳乐》《洛阳行》《松山哀》《萧史青门曲》《临淮老妓行》《雁门尚书行》《咏拙政园山茶花》《楚两生行》《琵琶行》《永和宫词》等,不一而足,脍炙人口,享誉一时,今日再读,说吴梅村的诗具有史诗性质,绝非夸张与过誉。他的《绥寇纪略》,他的《复社纪闻》,也有很清晰强烈的存史意味。吴梅村的剧本有《临春阁》《通天台》《林陵春》,他的剧本中先后出现陈后主、张丽华,也出现梁武帝、汉武帝,还有就是李后主。陈后主的胭脂井、李后主的一江春水向东流、箫衍极具戏剧性的荒唐起伏,这是吴梅村要影射崇祯帝?沈夫人也许有秦良玉的影子?沈炯、徐适有吴梅村不无自己的幽微心曲?据说《林陵春》曾经在如皋的水绘园里上演,当时的演出,冒辟疆是怎样的心事茫然触目伤怀?此剧演出,董小宛还健在否?有人说,《林陵春》还曾在湖南长沙演出过呢!顺治帝也曾看到过这一剧本,并就剧中人物细节,最终结局详细问过吴梅村。

在明清之际的天风浩荡风雨如晦之中跋涉行走,肝肠寸断,甘苦自知。

# 何以解忧,唯有行走

□甘武进



2023年11月  
新星出版社  
罗新《从大都到上都》

“何以解忧,唯有行走。”翻开《从大都到上都》这本书后,作者的话让我们深有感触:他希望完成从旅游者向旅行者的转变。他认

为这种转变比什么都重要,值得用一生的时光去追求,哪怕他不能取得世俗认可的那些成功——无论是少年时代所梦想的那种学术上的成功,还是如今他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上的所谓成功。

从元大都(北京)到上都(金莲川),是一条元朝皇帝候鸟般春去秋来的犍路,是一条从农耕文明渐变到草原文明的路。这里是山川的终点,草原的起点,贯穿长城内外,是自古以来从蒙古高原进入华北平原的交通要道。北大教授罗新,在华发之年,自北京健德门启程,沿着元代犍路北行,不畏烈日、暴雨、尘土飞扬,山路艰辛,穿行于田垄与山谷间,一步步走完了从健德门到明德门的四百五十公里山川河流,抵达上都,完成了他十五年前的夙愿。

在作者笔下,每一段路、每一条河、每一座小山,都凝固着历史的变化与传承。从昌平到居庸关中,要经龙虎台村,此村就在古代的龙虎台上。元帝北巡,例以龙虎台捺钵为正式告别大都之地,必在此留驻,留守官员也远送

至此。杨允孚诗云:“大臣奏罢行程起,万岁声传龙虎台。”元代皇帝以龙虎台为捺钵的传统,可追溯到成吉思汗。明初继承了元人的道路体系,仍以龙虎台为重要扎营之所。明成祖朱棣多次驻军于龙虎台,在此设宴大辇随驾将校,算是元明历史连续性的一个表现。

元人所写的两都纪行诗文中,居庸关出现的频率最高。自南向北者,忽然进入崖壁峥嵘的峡谷,风物一变,不免心神震荡,忍不住要诉诸笔墨。吴师道诗:“神京望西北,连山郁崔嵬;百里达关下,两崖忽中开。”就是写这种自然景观的戏剧性变化。胡助诗:“天险限南北,乱石如城障”,感慨关塞天险,觉得是上天要以此划分南北,强调山南山北是相当不同的两个世界。自上而返南者,到了居庸关,终于告别寒冷的北方,即将回到温暖的大都,可以想见他们心情大悦。

“当年读纳兰词,感觉真是超越时代,这样一颗敏感得不可思议的心,既亲切又陌生。想想他曾经吟在南沙河岸边,他所凝视过的

天空,他所吹拂过的夏风,和此刻大概也差不多吧!”其实,作者的行程就像一场意义非凡的凭吊与追怀,他以历史学家的角度观察草木枯荣、残垣断壁、山川河流以及众生百态,并展开诸多合理且不乏趣味性的联想,将史学科普适度又巧妙地融合进游记的思考中,在烟火气中找寻古人曾经所见所闻:“今人不见古时月,今月曾经照古人。古人今人若流水,共看明月皆如此。”

马克·亚当斯在《到马丘比丘右转弯》一书中写道:“我完成了从旅游者到旅行者的转变。”作者熟知纸上的中国,但更加珍惜自己用脚步丈量过的真实大地。他以旅行者的谦卑,一趟行旧路、思旧国、谈旧史、怀旧人、忆旧事的旅程,完成了从“旅游者”到“旅行者”的蜕变,为文明写下个人的刻度。通过行走的体悟,作者集聚了重新理解人与土地、历史与现实的重要力量:“我不做象牙塔内的学术研究者,要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,而不是一个远离山野、远离底层的人。”